



以文化人，功几许？

Discussion on Peking Opera <The Wild Boar Forest>

从京剧《野猪林》谈开

□张震



■京剧《野猪林》傅希如饰林冲

2012年12月18日晚，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《野猪林》。该剧集合了生、旦、净各家之长，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、杜近芳和袁世海的代表作。它对主要演员的要求很高（体力消耗也大），近年来很少有演员演出完整全剧。

这次傅希如扮演林冲，兼工老生和武生。他的这出戏由李少春的公子李浩天亲授，可谓“根正苗红”，这次演得也很到位。这些年，他的进步是实在的。我2005年7月在天蟾看他的《长坂坡》连《汉津口》，前赵云后关羽。那时，他的勇气固然可嘉，但终究还显稚嫩，或是紧张、或是用力过猛，在台上出现了一些失误。配角演员也没搞好，在开打翻滚中把道具刀都撑断了。这次安平、丁晓君（特邀）、王盾、

任广平等与他配合默契，而且全力铆上，甚至是“咬上”他了。京剧舞台上所谓的“咬”，语出尚小云。他经常对演对手戏的演员说：我不怕你咬我。意思是，希望那些演员倾尽全力表演，和自己飙戏，不要怕把自己比下去。

我把该剧和2012年4月16日，由上戏戏曲学院、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推出的，王立军主演的《野猪林》作了一个比较。那场演出，赵群扮演林妻，杨赤（特邀）扮演鲁智深。王立军在“结拜”、“白虎节堂”等段落中，运用大段剑舞和甩发中的“打”、“挑”、“旋”等技巧动作，显示了他深厚的武生功底，而且在唱腔念白中也韵味醇厚。可如果求全责备的话，他在处理低音方面还是有点控制不稳的现象。傅希如也有这个问题，他刚上场的时候，

声音高而窄，不显宽厚，或许喉咙还没唱开，及至“大雪飘”一段，听着也像，但给我的感觉是学书法练描红，而且是添笔描红。像则像矣，是则未是，遑论传神。另外，他的武生功夫不及王立军老到。这也需要时间的熬磨，书法有“人书俱老”一说，戏曲也如此。青苹果脆、水蜜桃熟，各有风韵，多有异趣。只是观众看老戏，听的是曲、品的是味。

说“人书俱老”，并非说艺术自然而“老”。演员表演，欲得神韵，需多揣摩。新剧能打磨，老戏也可参详。前辈大师对剧情人物的理解并不错，但青年演员如果只是把前人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，照搬照抄，那么今人想超过前人，就有难度了。

青年演员演绎经典，应该多想一想。哪怕转了一圈，还是回到前人已经得出的经验上来，这多想的一圈也不会白费力气。譬如《野猪林》，此戏为《水浒传》节选，历来脍炙人口。可奇怪的是，戏中高俅身为太尉，为了谋害一个手下，兴师动众挖了好大一个陷阱，不料被林冲三言两语的念白噎得讲不出话来，只得转送开封府审理，宝刀也作了呈堂证供，非复高俅所有（这可是高俅轻易不肯示人的宝刀啊），最后林冲还是没被整死。这合理吗？

高俅乍看上去像是脑子进水了。按常理想，如果要让林冲消失，完全可以像日本鬼子对付李士群那样。请他吃饭，菜里酒里随便哪里放点东西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哪怕没有鬼子的科技，做不出无色无味清澈透明的东西，可蒙汗药总有吧？就算蒙汗药浑浊不能用，那么让陆谦请林冲喝酒，再纠集几个人劝酒。汴河宽大，很容易造成醉后失足落水的结果。还可以像《铁弓缘》、《伐子都》那样，让林冲失误军机，甚至因公牺牲。事成后，高俅作为领导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关心慰问他的家属，还可以派儿子代为关心慰问，一来二去，好事就近了。就像“计赚徐宁”那样，把他家着骗上梁山。

本文不是写案例大全，但方法还是很多的。高俅为什么单单采用了这么个蠢办法？其实了解一下宋初的背景，我们就能“体谅”一下高俅的“愚蠢”。

赵匡胤黄袍加身后，加强皇权，重文抑武。宋初实行“二府三司制”，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。宋代任官制度有官、职、差遣三个体系。中央虽设三省，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，成为闲职。实际权力归属“中书门下”，又称政事堂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。以同平章事为长官，多由中书、门下两省侍郎担任，无定员。以参知政事为副相，分割行政权。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，长官为枢密使，与政事堂合称东、西“二府”。“三司”（户部、盐铁、度支）主管财政，号称“计省”，长官为“三司使”，号称“计相”，地位略低于“二府”。二府三司各自独立，互不统属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其实，北宋就是一群知识

分子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。皇帝的职位是固定的，大臣的“职位”是变化的，可上可下。大臣之间政见或有不同，可道德标准是公开的、是一致的。政见不同无法争出对错（条条大路都通罗马），而道德操守却能评判。因此，大臣（知识分子）之间往往砺以节操。有时甚至以节操之争，行排除异己之实。

例如，欧阳修的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。当时包拯任御史中丞，负责对官员进行监察。他先后以利用职权巧取豪夺和生活奢侈等理由弹劾张方平、宋祁两任三司使，致使他们解职。皇帝因包拯清廉，派他继任三司使。包拯受命，准备上任。欧阳修则认为，包拯连续弹劾两任三司使，自己却取而代之，会引起人们怀疑他的动机，不应让他接任该职。

其实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文化课题。如果从欧阳修的行为追寻下去，或许可以解释，为什么中国人直到现在讨论事情，往往只谈该不该，而不论行不行。例如，北宋王安石改革、司马光反复，新旧党争，蜀洛党争。南宋的战和之争，争论的是该不该打，而不考证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得住打？以至于“隆兴北伐”被影射成“元嘉草草”。从中可以看到，人们抢占的是道德高地，而忽略的是实证精神。中国文化重道德、轻实证。这当然是个弊端，但也有其积极意义。

佛经：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，若被物转，即名凡夫。茫茫大千世界，惟有圣人能够超然转物（物为我用），而凡人贪婪，为物欲所累，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。因此，在鹰攫狼顾的社会中，更需要人们有敬畏感，使其凭

借外力控制自己。可敬畏者，天子重封禅（自然），愚夫拜鬼神（宗教），智者敬圣贤（文化）。这最后一条，就是以文教化，以文化人。

高俅身处北宋末年，社会道德虽有沦丧，但大体格局还是在的。凡人作恶都是社会环境的投射，就像小孩画鬼，哪怕画出的鬼形有七眼八耳，终究还是人体的映射。高俅出身“混混”，作恶没有底线，可他混迹于官场。这是一个被文化约束的环境，他怕物议、怕舆论。对此，林冲心知肚明，因此他在堂上理直气壮，但他的情绪是有层次变化的。演员应该表现出来。

《水浒传》不愧为才子书，施耐庵是明朝人却深谙北宋社会。当然，小说必须如此写。非如此，“林五回”将如何卒篇。观众看戏会问一个为什么？演员演戏更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？想通了，就能更好地理解剧情、体验感情、塑造人物。李少春曾经强调自己是演“人物派”，后人学李少春不能只学他的唱腔技艺。

